

21

革命回忆录

懿风可范

——记刘伯承几件事

齐生平

从北伐战争到解放
战争

贺 诚

深切怀念高崇民
同志

关山复

党的挚友高金城
大夫

黄景渊 史 榕

合江剿匪记

方强等

人 民 出 版 社

革命回忆录

(第二十一辑)

人民出版社

革 命 回 忆 录

GEMING HUIYILU

(21)

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25印张 142,000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050

ISBN 7-01-000004-2/K·1

《书号11001·791》定价 1.20 元

《革命回忆录》丛书编辑例言

为了收集、积累、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，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，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，分册陆续出版。

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、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，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，仅供参考。

《革命回忆录》上刊载的文章，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。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，或因记忆有误，难免有不详尽之处。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提出订正、补充。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，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· 回忆录 ·

懿风可范 齐生平 (1)

——记刘伯承几件事

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 贺 诚 (27)

周总理批准我到外交战线工作 李 萍 (58)

忆桂林《救亡日报》..... 林 林 (66)

合江剿匪记 方 强等 (80)

寄语商洛山 缅怀吴焕先 郭述申 (103)

雄鹰西南飞

——忆试航拉萨 韩 琳 (116)

记海军支队的诞生与成长 欧阳文 (150)

· 人物介绍 ·

深切怀念高崇民同志 关山复 (164)

党的挚友高金城大夫 黄景渊 史 溶 (172)

毛主席致函雷经天严明党纪法纪 翟作军 (193)

夜袭山子头 活捉韩德勤 孙长兴 (197)

· 资料 ·

华北军区部队序列沿革 宋 文 (203)

(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)

· 回忆录 ·

懿 风 可 范

——记刘伯承几件事

齐 生 平

我在完成一件写作任务中，曾有幸阅读了有关刘伯承元帅革命事迹的一些材料，同时就有关线索采访了与他共同工作过的一些同志，从中受到了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作风的深刻教育。现在，刘帅与世长辞了。在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他的时候，我把他建国以后，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方面的一些片断整理出来，以飨读者并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、军事理论家学习。

共产党员不能接受馈赠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刘帅挥师西进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，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猬集滇、黔、川三省的八十万残兵败将，解放了祖国的大西南。

大西南解放之后，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、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。住在重庆市国府路西南军区院内的一所房子

里。

一天，他正在家里批阅文电，秘书推门进来，把一个包裹放在他办公桌上。他问是谁送来的，秘书回答说是龙云先生送来的。龙云先生是反蒋爱国民主人士，原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，一九四九年八月，曾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。

“龙云先生为啥子给我送东西呢？”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深思。他打开包裹，一看里面装的是两条鲜红的被面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原来，他的一个侄女最近就要结婚了。这是不是馈赠给他侄女的结婚礼品呢？

他看着那两条被面，想起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上的讲话，心里象波涛一样翻腾起来：祖国大陆已经解放了，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，共产党已经成为掌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。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下，享乐主义思想、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在少数干部中开始抬头了。他们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不愧为英雄好汉，但在胜利面前，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却受了伤，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！

想到这里，他拿起毛笔，在一张纸上写下了“共产党员不能接受馈赠——刘伯承”一行字。然后，把纸叠好，放进包裹，吩咐秘书一定要把包裹的来历弄清楚。如果确实是送给他侄女的结婚礼品，那么，不管是什么人送的，都要坚决退回去。

第二天，秘书向他报告：昨天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。原来，那两条被面是他侄女的未婚夫买的，因为在结婚之前工作

忙，没有时间送回家，就托一个在龙云先生那里工作的同志顺便捎到西南军区大院来。结果，门卫听错了，对秘书说是龙云先生送来的。听秘书解释清楚，他才放了心，笑着批评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办事粗枝大叶，不准不确。”

“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”

在吃、住、行等个人生活问题上，刘帅一向讲究原则，公私分明，不要组织照顾，不搞任何特殊化。他常说：“一个共产党员，在生活待遇上手莫伸、口莫张，走到那里都要清清楚楚。”

一九五一年，他领导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，任院长兼政委，全家也从重庆搬到了南京。当时，实行的是供给制。他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，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。并亲自关照炊事员：“黄瓜、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，不要买来吃。”他家孩子多，住房比较紧张。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几间房子，或把房子改建一下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后来，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的时机，在他家的楼房前面加盖了两间平房。他从北京回来，严肃地批评了营房部，并责成他们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住。

他对用车问题要求更为严格。他自己用车从来不讲究、不挑剔，而且也很节省。当时，他只用一辆旧的别尔卡轿车。车管部门为了他的安全，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，他坚决不同

意换。他平时喜欢步行，外出开会、办事，只要路程不远，时间来得及，他总是安步当车。

他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子女坐。他的夫人汪荣华同志，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。每年放寒、暑假，他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，开学时从南京走，他都不准用车接送，而让他们坐公共汽车。有一年，他的一个孩子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学校，开学时需要带行李，坐公共汽车不方便。为此，司机说了半天情，他也不同意开为私事而用公车的先例。有一年冬天，南京市下起了罕见的大雪，汪荣华很晚还没有回家。司机不放心，瞒着他悄悄地把车开出去，从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荣华接了回来。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。司机解释说，天气不好，又是晚上，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。他说：“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嘛！路又不太远，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？你要记住，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，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，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。”

给孩子买玩具的三条原则

象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刘伯承同志非常疼爱孩子。但是，他对孩子不娇惯、不溺爱，而是严格要求，晓之以做人和革命的道理，培养他们做革命接班人。

他教育子女，主要教育他们艰苦朴素，不搞特殊，从小热爱劳动，热爱劳动人民，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。孩子们的玩具，都是他的警卫员和司机在空闲时间，帮助他们用木头板

做的。孩子们的衣服，也都是用他和他的夫人的旧军装改的，而且老大穿了老二穿，缝缝补补给老三。

一九五二年汪荣华同志生了最后一个男孩。刘帅花甲之年得子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从孩子一出生，他就答应破个例，给这个孩子买个象样的玩具。但是，由于工作忙而一直没有兑现。一转眼，两年过去了。孩子会走路了，会说话了，一见到他总是嚷着要玩具。这一年的三月，他正巧在北京开会，会议结束的前一天，他想起了给孩子买玩具的事，可究竟买什么好呢？他想不出来。于是，就把警卫员叫到跟前，请他帮忙去办，说随便买个什么都行。但是要遵循三条原则：一、价钱要便宜，二、玩具要结实，三、孩子要喜欢。

晚上，警卫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他问玩具买到了没有？警卫员不高兴地嘟哝道：“好玩具多得很。但是按你那三条原则去买，就很难买得到。”他不相信，决定亲自去买。

第二天，会议结束了。他和警卫员一起来到王府井东安市场（现在的东风市场），果然，市场上儿童玩具琳琅满目，五光十色。他看了很长时间，总是嫌价钱太贵。警卫员沉不住气了，对他说：“我看就买个小汽车吧，上了发条满地跑，孩子见了准喜欢。”他问：“多少钱？”警卫员回答：“两块五。”“两块五，老百姓能拿它买多少斤米啊！”他心里反复盘算着这个数字，实在舍不得花这么多钱。最后，他挑来选去，花了三角钱买了一个小喇叭。

回到南京，他把小喇叭掏出来，对孩子说：“爸爸给你买了个小军号，你长大了当小号兵好嘛？”孩子整天玩木头枪都玩

腻了，看了铁制的小喇叭自然喜欢，于是高兴地说：“好！”便一手抓过去，“嘀嘀嗒嗒”地吹起来，蹦蹦跳跳地玩去了。

这时，他很风趣地对警卫员说：“你看，我买的不错吧！这玩意儿又便宜、又结实，摔也摔不坏，孩子还挺喜欢哩！”听了他的话，警卫员也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起来。

没有大师傅做饭，什么家也成不了

刘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尊重、非常关心。他每次外出开会或办事，都提前打招呼，让司机选择好行车路线，让有关人员做好准备。出发前，他总是让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先吃饭，而自己最后吃。免得他们着急而吃不饱、吃不好。向工作人员交待任务，简明扼要、清楚明白，有时还让你复述一遍，不准确的地方就当时纠正，或者写个条子。

有一次他外出时，已是深秋季节，天气较冷。他看到一个随行的同志衣服单薄，就买了件毛衣，让那位同志穿在身上。他的秘书胳膊上长了个瘤子，住院动手术期间，他几次让夫人汪荣华做好鸡汤，送到医院给秘书滋补调养身体。

他家里有个厨师，姓王，四川菜做得很好。只是年纪大，没文化，思想比较保守，脾气也比较古怪。为此，经常与其他工作人员发生矛盾。管理员几次向他提出，把老王调走，再换个厨师来。他一直不同意这样做。

一个星期六下午，他参加了他家工作人员的党小组生活会。会上，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发言说：“今天，大家在

一起谈思想，过组织生活。我先发个言，为老王说句话。老王是个大师傅，大师傅的工作是很辛苦的，也是很光荣的。他在旧社会时间较长，旧思想多一些。我们党员同志要多帮助他，不能嫌弃他、疏远他，甚至想把他调走了事。”接着，他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由于工作忙，对周围的同志关心帮助不够的问题，使党小组的同志们很受感动。最后，大家统一了思想，一致表示要热情帮助老王共同进步，并且制订了教老王学政治、学文化、提高思想觉悟的具体措施。

这一年的春节到了。除夕之夜，刘帅一家与工作人员一起会餐，吃团圆饭。大家就座之后，他把老王从厨房里请出来，斟满一杯酒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老王啊，你一年辛苦了，我先敬你一杯酒。大家都说我是军事家，我实在不敢当。这都是党的功，人民的功，我不敢贪天之功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，没有人民给吃、给穿、给饷，军队就不能打胜仗。没有你老王师傅给我做饭，我什么家也成不了。”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，使得老王和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非常感动。餐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大家争先恐后地向老王敬酒，而老王却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不要打我的牌子，
我也要向党中央请示汇报的

军事学院建院初期，教员十分缺乏。学院干部部门多次打报告，请示总政从各部队调一些有文化的同志来任教。可是，由

于种种原因而调不来。于是，他们找到刘帅，提出能否以他的名义直接给总政写信，解决此事。他说：“这样做不妥。我们还是按组织系统写报告，把实际困难如实反映，并协助总政与调人单位协商解决。千万不要打我个人的牌子，我也要向党中央、向军委请示汇报工作的。”

刘帅一向服从党中央的领导，尊重党的各级组织，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。他严格执行党中央作出的《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》的指示，从一九四八年五月他任中原军区司令员，到一九五七年他离开军事学院的领导岗位，在九年多的时间里，一直坚持每两个月向党中央、中央军委作一次工作综合报告，从未间断过一次。而且，绝大部分报告都是他亲自动手起草的，有些还是他亲笔誊抄的。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，他都严肃地申明原因。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三、四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，就曾写道：“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，脑眼又病，所以，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，谨此申明。”

一九五四年二月，刘帅在北京出席中央重要会议。在会议进入大会发言时，由于与会人多，会议秘书处要求发言要简短，最好能在十分钟内讲完。为此，秘书给他拟了两个稿子，但他都没有采用。在事关党的集中统一的重大问题上，他要自己动笔写发言稿，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稿子写好之后，他让秘书看着表计算时间，自己照着稿子念了好几遍，仔细琢磨在十分钟之内讲完用什么速度才合适。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象一个恪守校规的学生那样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。

在大会发言中，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、专横跋扈是障碍党的集中统一的根源，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：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，又是从四川旧军队那里出来的。后来，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“绝对服从党”。此后即经常自勉，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，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，并以身作则，教育所带部队完全接受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，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。他用真切诚挚的态度，朴实的语言，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。

“我的话不能当做标语”

一九五二年夏季的一天，刘帅正坐在办公室里的藤椅上看书，秘书走了进来，交给他一封中共中央宣传部寄来的信。他打开一看，信中写道：

刘伯承同志：

兹寄上苏联大百科全书“刘伯承小传”稿一件，请你详细补充和修正其中所叙事实，于七月十七日前退给我们。

他又打开稿件，看到稿件开头几行字是这样写的：“刘伯承，生于一八九二年，四川开县人，革命军事家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。”

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在办公室踱了几步，然后坐到写字台前，把稿件铺开，拿起毛笔在上面改了起来。他把“革命军事家”五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，添上一个“人”字。

秘书站在旁边，一边看他改一边读：“革命军事家，革命

军人，……”这时，忍不住发表了意见：“你这样改怎么行？‘革命军人’，人民解放军里每个同志都是革命军人，我也是革命军人。人家这是写你！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秘书严肃地说：“我又怎么样？我也是革命军人嘛！人民解放军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，革命军队是个‘大家’，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！”说完，他又对稿件在事实上做了几处更正，让秘书誊写清楚，寄给了中宣部。

这一年“八一”建军节前夕，他从北京开会回来，看到俱乐部的几个文化干事正在大礼堂前布置宣传橱窗，悬挂大幅标语。其中的一条标语上写着“攻书求实用，应如攻坚求战果。”这句话是他在五月五日为军事学院政治部主办的《军学生活》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。他马上对他们说：“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！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？不行，不行，快把它换掉。”

他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普通一兵，摆在革命军人的行列之中。

“我院长怎么做，顾问团也要怎么做”。

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初，刘伯承同志领导军事学院高、上级速成系学完“军进攻战斗”的课程，又指导他们实施“军首长一司令部野外演习”。在学院工作的苏联顾问团也派出几名顾问参加这次演习。演习地点设在江苏句容至丹阳的

广阔地区。

在演习实施过程中，刘帅栉风沐雨，风餐露宿，十分辛苦。白天，他深入现场指导学员作业，晚上，也和学员一样，睡在野外临时搭起的帐篷中。

当时已是初冬，天气渐渐寒冷起来。为了让大家休息好，他指示一个负责后勤工作的干部，给每顶帐篷里放一盆炭火取暖。但在睡觉前一定要把火熄灭，把火盆搬到外面，以免煤气中毒，发生事故。他自己首先这样做了，并让这个干部逐个检查。

这个干部检查完毕，向他报告说：其他同志都做到了，只是苏联顾问怕冷，不肯这样做。他微微沉思了一下，说：“为了顾问同志的安全，你再去一趟，传达我的话，就说‘我院长怎么做，顾问团也要怎么做。’”苏联顾问对刘帅是非常尊重的。这个干部照此传达之后，他们很快就把炭火熄灭，把火盆搬了出来。

当演习进行到第二阶段，又与苏联顾问发生了矛盾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演习第一阶段，“我军”第一梯队突破“敌军”第一道防线，前出到句容以东的白兔镇一带。“我军”第二梯队也加入战斗，准备向纵深发展。这时，“敌人”增援部队的一个先头团赶到了白兔镇，正在抢修工事，企图顽抗。面对这种态势，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，首先给立足未稳之“敌”一阵急袭，然后以第二梯队加入战斗，坦克引导步兵，宽正面、高速度、大纵深沿公路向前推进。担任演习军长的杨勇同志不同意苏联顾问的主张。他提出：以“我军”第一梯队实施正面攻

击，以第二梯队向“敌人”翼侧迂回，将“敌人”增援部队的那个先头团分割包围，予以全歼，然后再向纵深发展。

两种意见争执不下，演习暂时停了下来。

刘帅完全同意杨勇的意见。为了不把关系搞僵，他亲自到苏联顾问那里，作了含蓄委婉的解释。他首先说明，对于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特别是苏军组织指挥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先进经验，我们一定要学到手。接着，他强调，学是应该学的，但在运用时则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。最后，他解释说：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是，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，还达不到苏军的现有水平，实施宽正面、高速度、大纵深的硬性突击是无法做到的。他的这番话，说得苏联顾问一个劲点头称是。演习按照杨勇提出的方案继续进行。

类似这种情况，曾经发生过多。刘帅对苏联顾问是很尊重的，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也是认真听取的。但是，他从来不迁就、不盲从，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，从而使得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。同时，也赢得了苏联顾问的尊敬。

给学员送金钥匙的人

军事学院创建初期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学员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，给学习军事课程带来一定困难。为此，刘帅决定在学员中开设文化预科，先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学习文化，